

挽救港影業重在三點

□吳君瑜 劉婷

香港電影業要重創輝煌得看以下三點對策：一是培養人才要重視個性培養；二是要與擁有13億人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持續高速增長的內地緊密合作；三是在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不斷創新，才能拍出中國人喜歡、世界各地人也喜歡的電影。



從1896年電影傳入香港以來，黃金時期到近十年來的低迷衰退期——年產量由最高時的300部（1961年）到2007年只有51部、全年票房由巔峰時期的以數十億計到如今不超過3億港幣。是什麼原因使得曾經有「東方荷里活」之稱的香港電影業走下坡路呢？

「九七」時，部分港人由於對香港回歸不了解和不確定，在香港回歸之前出現了移民熱，許多財團和資深影人也移居到國外或是到荷里活，特別是財團的轉移對電影業的影響是不小的。而在香港回歸後一切正要穩定的時候，亞洲金融風暴又捲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電影業也正式進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

西片入侵香港市場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一個影響是西片進入香港。上世紀90年代以後西片開始在香港賣座，93年《侏羅紀公園》在香港創下6000萬港幣的票房佳績；98年《鐵達尼號》則完全壓倒了80年代的《英雄本色》系列和《最佳拍檔》系列，以超過1億港幣奪得全年香港票房冠軍；05年，全年香港票房冠軍由《哈里·波特與火焰杯》奪得，票房為4600萬港幣……追根西片之所以在香港賣座，是因為80—90年代初香港電影題材類型單一，主要以武打片和警匪片風靡亞洲影壇，喜劇片只佔少數，文藝片甚至差點發展不起來。隨着科技的飛速發展和人們自身文化修養的提高，人們對動作片的热情逐漸遞減，對熟悉的演員臉孔和劇情模式也開始感到疲倦，這就給西片的抬頭大大提供了機會。

盜版現象是一個大問題。首先由於相關的法律法規懲罰措施不夠嚴厲，使得一些人敢於鋌而走險，加上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使得盜版越發快速、成本低和容易。80年代由於錄影帶市場的興起，電影業開始出現盜版現象。近年來網絡的高速發展則使盜版惡化到極點，許多人連幾十塊錢的盜版費用都省了。其次就是電影界業內人士監守自盜。一些影片未上映就被翻版，而且清晰度高、質量極佳，這些都表明了大有可能是

業內人士所為。如此，香港電影業怎能不走滑坡路？

基於以上因素，90年代中後期，電影人才開始大量流失，一些資深電影人或是淡出、或是改行、或是轉戰荷里活。首先是導演方面的人才流失。有「暴力美學大師」之稱的吳宇森，由於家庭原因已於93年轉向荷里活發展，並在之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而以天馬行空式的武打片風靡亞洲影壇的怪才名導演徐克於97年轉戰荷里活，失敗後回到香港，但是觀眾對他回港後的作品除了《順流逆流》外其他大都評價不高。同是從香港影壇走出荷里活的導演還有王家衛，其作品在香港在國際都可算是為數不多的好的文藝片，但是觀眾對於其2004年的作品《二零四六》的評價也已不如以前，而之後王家衛也開始把目光投向荷里活。還有唐季禮、袁和平、林嶺東等著名導演也紛紛前往荷里活發展。演員方面，周潤發、成龍、李連杰、楊紫瓊等巨星級資深演員也於近年陸續往荷里活發展，張國榮、梅艷芳則已撒手人寰，而洪金寶、張曼玉、鍾楚紅、吳鎮宇、劉青雲、梁家輝、吳君如、曾志偉、王祖賢、關芝琳、劉嘉玲等資深影人大多也開始淡出改行或是很少拍片或是轉戰電視台。現在能獨挑大樑的新人又有幾個？

電影人才大量流失

香港電影業本身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快餐式的電影商業模式。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進入空前的繁榮時期。為使得利潤最大化，拍電影快餐化到極致——十天半月即出劇本，甚至邊拍邊寫……這種為節約成本而不顧影片內容質量的勢利態度造成了許多爛片的出現。再看看近年的新片，大都是形式重於內容的商業大製作，講究明星陣容、排場奢侈浮華，不但成本高，而且既不深刻又缺少創造力。二是抄襲跟風製作。很多商業電影為了迎合觀眾，有時簡直就是在套用荷里活某些著名經典影片，類似的題材搬來套去，幾乎到了氾濫的地步。三是缺少文化底蘊，不重視藝術性的追求。商業影片大都就像所謂的「肥皂劇」一樣，除極少數精品外，大多數看過

之後很快就會被遺忘了，唯有觸及人類心靈深處、能引起人們共鳴、深思的影片和有深度的文藝片才最耐人回味。在八十年代之前，香港的文藝片一直發展不起來，1979年的「新浪潮」電影運動雖然出現了一批具有較高藝術爆發力的年輕導演，可是在商業模式浪潮的衝擊下，短短五年就被淹沒了。

不斷創新才能自救

其實，香港電影業重創輝煌可能要看以下三點對策：一是人才培養，是日前香港電影業走出低迷的當務之急。由於香港沒有正規的電影藝術學院，人才培養可以通過演藝學院或各大高校增設表演藝術系和傳播系進行培養。但人才培養不能僅僅視之為流水作業工具的培養，而要重視個性培養。而資深的影人在幫助培養新人的同時也要大方地把更多機會留給新人，讓新人有機會進行各種嘗試。

二是與內地的合作，是目前香港電影業重創輝煌的未來走向。首先，內地擁有廣泛的市場。隨着時代的進步、各種娛樂方式的大量湧現，目前香港電影已經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和娛樂需要，香港這個只有700萬人口的城市也無法給予電影業發展提供足夠的市場空間，而只有擁有13億人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持續高速增長的內地才能為香港電影業的發展提供充分的市場空間和各種題材資源。其次，內地有許多專門的電影藝術院校，不但培養了大批有相當實力的電影人才，而且各種各樣的人才應有盡有。第三，CEPA協議簽定後，港產片已經被內地豁免了進口影片的入口限制，一部由內地和香港合拍的影片，只需一半的主要影人是香港人，就可以被認為「香港製造」。其實是否是香港製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電影。香港只有和內地聯合起來，集兩地的經驗和人才優勢，香港影壇人才的缺失問題才會得到緩解，香港電影業也才有可能重創輝煌。

三是只有在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才能拍出中國人喜歡的電影，才能拍出世界各地人們都喜歡的電影。

伍淑清堅忍努力終成功

□香峰



先聲奪人，老早獲得改革開放的先機，三十年前第一個取得內地的「中外合資證書」註冊編號的人物，她就是伍淑清。伍淑清在《香港家書》電台節目中，暢談自己三十年來的風雲際會，回味起來，感受殊深，較之後來進軍內地市場的商人更認識到國家改革開放的步伐是何其大，影響是何其深遠。

伍淑清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與國家有關部門簽署了編號為零零一的「中外合資證書」，成為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創辦人之一。回想當年國家還處於改革開放的前夕，她抱著「為合資企業與世界接軌」的營商理念，與內地人員合作，獲得從不愉快到愉快，從營商概念完全不同到拍合成功，研製出豐富的飛機餐的過程，認為中國內地走改革開放道路的及時、正確。

艱苦經營三十年

只有親力親為的人，才能明白付出是何等的艱辛，成功是何等的寶貴。伍淑清以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為例子，說：「當時，我們在香港牛奶公司找到三十多名飛機餐配餐人員幫忙，要他們協助提高內地飛機餐配餐水平和生產流程，以及食品原材料的衛生和現代化企業管理。最初大家語言不通，產生很大困難。」香港飛機餐製作嚴謹，食品公司規定所有工作人員入廚房前要先洗手、換制服、戴口罩和頭套，廚房內不准吸煙，上班要打咭。政策實行初期，員工對此很抗拒，認為不需把一份飛機餐看得如此重要。公司解釋，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企業走向世界的起碼要求，衛生標準必須達到國際水平。現在回頭再看這些問題，伍淑清感嘆與三十年前內地生活水平偏低不無關係。伍淑清選以「飛機餐廚房不只是一個廚房，而且還是一個學習管理的課堂」作為切入點，告訴內地員工，每個部門都要有部門負責人，都會實行部門負責制」。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她終於確立了內地飛機餐的高質量高水準，獲得業界讚譽。

伍淑清獲得中外合資證書的榮譽，固然是她勇於進取、敢於迎接挑戰的結果。三十年過後，她更深刻地認識到，迎合時代需要也非常重要。在當前科研是發展動力的形勢下，她讓員工認識到與世界科技接軌的急切需要，進一步強化企業的技術先進性，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令企業大有可為，前景樂觀。

有一句名言這樣說的：「烹調『成功』的秘方是把『抱負』放到『努力』的鍋中，用『堅忍』的小火煨熬，再加上『判斷』做調味劑。」伍淑清於三十年前便展示了自己的抱負，三十年來不斷努力，遇挫折能堅持、忍耐，也深具決斷力，才令她獲得了今天的成功。



唐樓建築值得保育

□丁傘



舊年代建築的唐樓，在很多年前我們不知它們的價值，以為在現代化的、城建高度迅速發展的香港大都會非常礙眼。慢慢地，因為城建甚快，舊的不斷被拆，不斷消失，數目越來越少，才發現了它的價值，於是所謂「保育」、「活化」、「集體回憶」這類新詞出現了。政府發現太子道西的十幢戰前

「騎樓」建築群和上海街十幢樓甚有價值。事緣前者樓下就是花墟，市建局有意打造成「文化花墟」；後者以前曾是淫窟，市建局想將其變身為「道地食肆」，計劃在2015年完成。認真說起來，富有歷史價值的唐樓群，不止上述兩地。在九龍城、聯合道等一些區域，「好看」的，有改造、修葺可能的唐樓建築群比比皆是，值得加以活化和保育。前身為石硤尾工廠大廈的大型廠房在今年九月保育活化成賽馬會藝術創意中心，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但它畢竟太靜態，如何「活化」，使之成為遊客愛遊之處，值得我們考慮。星光大道是新建的，很快成為攝影勝地，其原因值得研究。

一些唐樓集中的地方，比如聯合道整條街，白天幾不見人影，死氣沉沉，與一些人流極旺的地方，如黃埔花園、黃大仙上鄉下鄉政府公園集中地等，形成鮮明的對照。畢竟這些唐樓樓高至多五、六層，人口又老化，一旦居住者深居簡出，附近又無大型商場，那就成了大城內的僻靜小角落了。這些唐樓，有的從外型看上去很美，很有保留價值。修葺、活化之後令其變成有觀賞價值的建築群，那是需要代價的。現代化的東西不少城市都有。如果香港還保留典型的唐樓、街市、大牌檔之類，那就比一些國家的新城更有看頭了。新的現代的太多，人們就要看舊的了。

美國海關也來「中英並舉」

□黃海振

筆者雖然學了多年英語，但由於用得少，總覺得不地道。去年到美國旅遊，從芝加哥機場入境，第一件事就是要和美國入境官員對話。美國官員看到我的香港特區護照後，開始例行問話，內容無非是「你準備居留多長時間」，「知不知道不能在美國做工和上學」等。但由於入境官員沒聽懂我的「港式英語」，只見他邊抓頭皮噴着Hong Kong, Chinese, 邊蹲下頭在尋找什麼。他很快找出一塊紙板，上面有需要問話的中英文問題，他輕鬆地指着有關問題問我，我也輕鬆地回答所有問題後，多說了一句「It's a good idea. You are so clever.」（這是個好主意，你很聰明）。入境官員感到很高興，竟連忙說「Learned from Hong Kong. Learned from Hong Kong.」（從香港學來的）。

美國入境官員還透露，他們是收到上級統一布置後推出「英中並舉」這項服務的。目前，美國的華盛頓、芝加哥、洛杉磯、紐約、底特律和三藩市等大城市的航空入境處，都已經為中國遊客提供中英對照的指示牌和中英對照卡等服務，以方便日益增加的中國遊客。除了美國，「中英並舉」同樣為英、法、德等歐洲國家使用，並成為他們吸引中國遊客的一個法寶。

內地愛用香港專才

一位澳洲朋友是旅遊專家，曾遊遍世界各地的著名風景。去年帶着她不懂中文的兒子來香港遊玩，希望再嘗嘗香港這顆東方明珠的美食、和觀賞一下回歸11年後的新香港。幾天後將離開香港時，我問她兒子，對香港的印象如何？她的兒子說，感覺很好，就是人太多。我又問會不會有語言方面的障礙時，他覺得很奇怪，反問道：怎麼會呢？香港的路標、廣告甚至餐廳的菜單跟英國、澳洲等西方國家都是一個樣，完全沒有不習慣的感覺。天天生活在香港的人不覺得，原來這些中英文對照的路標、廣告和餐廳的菜單居然能夠給來香港的遊客帶來那麼多的方便，這種獨特的香港文化竟然還可以成為西方國家學習的榜樣。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共有120多萬的優秀青年到外國留學。這個數目看起來好似很多，但和中國13億人口相比，其實所佔的比例卻很小。另一方面，到目前為止，學成回國的人數僅為30多萬人，其他的大部分已經流向他國。目前，無論是中國的國有大企業、或者是民營企業，隨着國際業務的迅速增加，最缺少的就是國際人才。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其中的律師、會計、貿易、市場拓展、企業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卻非常豐富。正因為如此，聘請香港的各類專才就成為內地企業的第一選擇。據內地有關部門統計，香港近年到內地工作的專才至少有幾十萬人之多。香港和西方國家的廣泛聯繫和人脈關係，也是內地企業喜歡聘請香港專才的原因之一。

大學研究成績斐然

香港的中西方交融文化還表現在教育文化上，香港的教育一方面秉承中華優秀傳統，另一方面又接收大量西方文化，成為獨樹一格的中華文化。即使受殖民管治的時代

，香港始終沒有放棄正宗的漢文化。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大學，香港學校的教學內容、教育方式等都與中國內地沒有太大的分別。香港的中文教材中仍然大量使用華人喜愛的「床前明月光」等唐詩、宋詞佳句。由於香港教育文化融入了中西方精華，使香港學生的適應性更加廣泛，且屢獲佳績，2007年就有畢業不久的香港大學學生被美國企業以9萬美元年薪錄用，該數目比美國一般大學教授的6萬美元年薪高出五成。

目前，香港九所大學的國際化程度媲美世界各地最好的大學，所有大學的教師招聘工作基本上向全球開放進行，大學的許多研究項目亦都達到世界同行的先進水平，有的甚至領先全球。廣泛應用在現代通訊中的光纖技術，就是在香港最先研究成功的，香港專家高錕教授還被世界同行尊稱為「光纖之父」。以香港科技大學為例，該校來自全球的500多名教授，100%擁有博士學位，其中三分之二畢業於包括哈佛、劍橋、耶魯、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學。香港各所大學的學生也來自世界各地，近年更加吸引了大量中國內地的高材生到香港各大學學習。優質的教授和學生，成為香港九所大學最寶貴的人力資源，使各大學在教學和研究領域均可以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效。



索債老鼠

·三龍·

亞視改變弱勢非難事

□余劍鋒



音的說法未免太過武斷，但不說服力不強，更給人包含頗濃政治意識的感覺，是不妥當的說法。

不應先自認弱勢

若論香港兩個免費電視台的新聞節目，坊間有識之士的看法認為，亞視不論在組織、編輯上都較對方強。其實，新聞節目向來是亞視一張王牌，形象也已深入觀眾心。因此，亞視新高層首先向新聞部開刀已不妥當，引發反彈便在所難免，說明的是高層不準改革目標而自陷泥潭。

在每天午間新聞這個時段裡，不少白領階層都傾向看亞視新聞節目。如果要說慣性的話，這種對亞視新聞節目的慣性收視，應該提到肯定的角度才為合理。但是，坊間似乎在亞視高層大變動之中沒有看到這一焦點，才導致對亞視新聞節目明顯存在不公正的看法。

此前提伯欣掌握亞視的時代，以「慳儉」作為原則，扭轉了亞視的虧蝕局面，令亞視的收支出現平衡。誰都知道，一間免費電視台的營運，靠的是廣告作為主要收入，不論廣告多寡，如果無視節流的重要性，便可能導致嚴重的虧蝕局面，節流往往被錯誤認為是削弱電視台的「毒藥」。

其實，只要節流有方，便可以達到既不損電視節目質素，又可以令運作正常的雙贏局面。由於對亞視的炒作一直停留在負面因素上，才令坊間對亞視有所謂「弱勢收視」的定格說法。

舉例而言，最近亞視有一齣韓劇《王與我》在黃金

時段播出。該劇與《大長今》相比，製作、演員陣勢、演技熟練程度均不在其下，但似乎收視率就難以與之比擬。究其原因有二：第一，在目前韓劇已經進入較為消沉的階段，亞視才引進這齣高製作韓劇，明顯有高潮已過，收視可能下跌的壓力。當然，問題不能以一句話概括，或許當中有該劇製作未完成、在韓國當地未播完、協議簽訂需時等因素，但社會情緒未及《大長今》播出時那般高漲卻是事實；第二，《王與我》在香港播出前後，亞視宣傳明顯不足，造成最大致命傷。對比《大長今》播出前後便高調邀請李英愛訪港，並刻意為社會掀起一陣李英愛熱，令播出效果明顯。但《王與我》的宣傳幾近零，如果認為宣傳需要花一筆而省下來的話，就是一種不明智的做法，亞視本身就是媒體，不可能不知道宣傳的重要性，這個例子應引起重視。

新瓶可裝新舊酒

有言論認為，亞視要提高收視率，首先必須在是否改變「新瓶舊酒」的問題上有進取思維。新瓶是不是一定要裝新酒，答案並不完全肯定，新瓶既要注入新酒，以體現新人事新作為，但也要保留有影響的舊酒，一刀切把舊的但口碑佳的節目丟棄，可能造成新形象未形成，舊的好傳統卻被消滅，得不償失之下令弱勢更為加劇。這次亞視高層人事在處理「舊酒」上，明顯就有不足取的地方，在事件已告一段落之後，亞視應認真檢討近期的做法，以利從中汲取教訓，避免同類事件重演。

如何做好新瓶新舊酒擇優共融，這裡有三種建議：第一，亞視目前在晚間黃金時段，除了最近改變的半小時資訊節目稍為令人覺得有改革味道之外，前此採取的連續以三套外購劇支撐是一種很不健康的做法。一間電視台的影響力，黃金時間播出的內容被視為最重要的標誌，整段黃金時間由外購劇填塞，已形成一種別人不看扁自己，自己卻先看扁自己的現象。因此，應考慮黃金時段投放資本製作本台劇集或含金量高的資訊節目；第

二，認真調查哪些時事、新聞、生活、經濟、政治受市民追捧，並由此尋找焦點事件加以演繹，改革的方向才會明確，試行之後才可以確定節目的保留、淘汰或僅存措施，相信這樣可以令收視大轉變；第三，全面檢討舊節目，值得保留的應保留下來，值得啟用的要大膽啟用，可供參考改進的應作跟進研究，以新包裝推出市場，進一步提高質素，使之成為市民喜愛的長壽節目。

創新改革莫遲疑

正如時事評論員李鵬飛在一個論壇上指出的一樣，世界上沒有「慣性收視」這回事，有的是知道節目能否迎合市民口味的差別，而這一點正是造成亞視弱勢的主要原因。如果不針對真正的矛盾和焦點採取有效措施，就不能加以改進，除了效果不彰之外，還會拖累財政狀況的惡性加劇。

此外，網上世界對電視節目的衝擊也越來越明顯，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對於「公仔箱」的興趣已大幅滑落，電視台在如何應對網上世界的衝擊力須及早有所籌謀，如果等到出現明顯殺傷力時才迎戰，便為時太晚，遭受嚴重傷害更勢在難免，甚至出現殘酷的倒閉局面。目前已經有一些平面傳媒主動走向電子化，雖然涉及的製作費十分龐大，但其看到媒體發展新趨勢的犀利眼光，以及為了搶佔市場份額而作出的戰略部署，卻十分具前瞻性。本身就站在受到衝擊的改革前線的電視傳媒，更沒有理由不未雨綢繆。

總括而言，亞視並非弱勢電視台，市民更不應被某些向來善拿政治有色眼鏡透視社會現象的別有用心政客之言論所誤導，視亞視的「弱勢出之於政治原因」。應當相信，亞視在經過這次高層人事變動，汲取教訓之後，一定能夠作出調整和部署，盡快在推出新節目和保留名牌節目相互配合上都有新的鋪排，營造出一種全新的運作模式。